

## 近四十年來台灣民間文學的 調查、研究狀況

林培雅\*

### 摘要

台灣民間文學的調查與研究早在日治時期即已開始，當時著重在文本（text）的蒐集與紀錄。然而早在1950年以前，歐美就已經將焦點從文本擴大到情境（context），其中人類學派重視情境，文學學派重視文本；1960年代，兩派有逐漸合流的現象，將文本與情境都納入調查研究中；到了1970年代更發展出表演論的觀點，視講唱者為表演者（performer），將焦點擴大到表演者身上。因此text、context、performer三者合併已成為美國近四十年來民間文學調查、研究的趨勢。西方民間文學界在這四十年來有如此長足的發展，台灣的腳步雖然稍遲，卻也逐漸跟進。1960年代開始，人類學學者已經很清楚認識到講唱情境的重要性；1990年代人類學學者與文學學者也初步將焦點擴大到表演者身上；2002年文學學者胡萬川展開台灣民間文學積極傳承人的調查與研究，將text、context、performer結合在一起，帶領台灣民間文學走向一個全新的發展，追上西方的腳步。

關鍵字：民間文學、傳承人、文本、情境、表演者

---

\* 作者為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講師

1 近四十年來係指1960年代以後迄今這四十幾年。

#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Conditions of Taiwan Folk Literature in Recent Forty Years

Lin, Pei-Ya \*

## Abstrac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Taiwan folk literature began from the period as Japan governing. It was focus on the record and gather of text. However, before early 1950, the focus has been extended from text to context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anthropology school emphasizes on context and the literature school emphasizes on text. The two subdivisions of research groups were gradually merging together in 1960s. In 1970s, the viewpoint of performance was developed. The narrators are considered as performers. The focus has extended to the narrator. Therefore, merging text, context, and performer becomes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endency of America folk literature in recent forty years. Comparing the progress of West folk literature research groups, Taiwan's research groups lag behind a little. However, the folk literature research groups has gradually kept up with the West groups. From 1960s, anthropologists have found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In 1990s, anthropologists and literature researchers extended the focus emphasis on the performers. In 2002, the literature researcher Hwu Wan-Chuan began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Taiwan folk literature bearers. He combined text, context, and performer. Therefore, the Taiwan folklore literature research has a new development and catch up with the West research.

**Keywords: folk literature, bearer, text, context, performer**

---

\* Lecturer, school of Taiwanese Language,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 —

20世紀初，對民間文學研究影響最大的首推芬蘭學派（Finnish School），此派首倡民間故事的「歷史——地理研究法（Historical-geographical Method）」，其特點在於：

盡可能搜集大量異文，加以分類編排；進行細緻的比較對照，「從其歷史演變過程中追溯特定故事的原型，從其地理流布途徑追尋故事的發祥地」；不僅著力追尋民間故事的原型，並研究故事原型在不同時間空間所產生的異文中的變化，「了解特定故事的完整的生活史」。<sup>2</sup>

該派以文本（text）為主要研究對象，也就是著重在內容、類型的研究上。研究重點在於探究民間文學最初的起源，以及原來最可能的樣貌，和各類型之間的關聯與差異，還有內容的流傳、變異等等。他們認為現在的故事都是不完整、不完美的，最完整、最完美一定是最初的樣態。這種觀點後來受到俄國民俗學家 Vladimir Jakovlevic Propp 的反對，他認為無論如何都無法證實故事最初有一個最完美的型態，而問題的癥結不在於內容，而在於故事的敘述結構。<sup>3</sup>然而不管是芬蘭學派從內容、類型，或是 Propp 從敘述結構去研究民間文學，其所關注的對象仍在文本上面，所以他們或從歷史檔案的記載、或從田野調查中積極去搜尋不同的文本，進行比較分析。因為關注的焦點在文本，所以前述的研究學者較不強調田野調查的重要性，即使如格林兄弟會去進行田野調查者，在採錄民間文學時，通常將重點放在文本的取得，而不太會去注意、說明、甚至是忽略文本以外的外在環境對民間文學的影響，也就是講述的情境（context）：包括講述的時間、地點、場合等，還有聽眾的反應與講述者之間的互動等等。

民間文學的研究基本上可從幾方面著手，一是對於民間文學資料的各種異文作歷史、地理的對比分析，以見其文化意涵及可能的流傳與變異；一是就各異文的各自文本，做文學內容、類型、母題意涵及心理、歷史等的分析理解。以上這些都是可以藉著文字、檔案就能充分呈現，後來者也可以藉這些文字資

2 劉守華、巫瑞書主編，《民間文學導論》（武漢：長江文藝，2001），頁149。

3 Vladimir Jakovlevic Propp,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Press, 1968) .p.5.

料就能夠再進行研究的。因為不論各地的異文如何，基本上這一層面所關涉的還是以環繞文本為主所做的歸納、分析與探討為主要重點。但是將民間文學的存在只當作是「文本」的存在，是把民間文學窄化成只是「文學」的一個小小分支的錯誤的看法。民間文學當然有文學的一面，但它更是因應情境而演述的立體存在，也就是它不只是文本（text）的，更是情境（context）的。而且更是有著因人而異的特質，以及相應而產生的多種面相。

早期的民間文學學者將研究重點或放在故事的起源與流傳，或放在敘事結構上，而非研究故事對人民的意義。用來做為跨文化比較研究的文本只是摘要，而非與社會、文化有關的完整內容。他們一直認為民間文學是共有的，沒有個人意識與個人創造性，然而 1940 年代的東歐學者 Mihaly Fedic 出版的關於 86 歲的不識字的故事傳承人 Guyla Ortutary 的報告中，將這長期以來的迷思打破。在報告中，Guyla Ortutary 對自己的講說藝術感到很自豪，宣稱自己是故事的作者，而也確實發展出自己的美感語言。<sup>4</sup>由此可知，在 1940 年代民間文學調查與研究的侷限性已經被突顯出來，而若一直將焦點放在文本的關注上，很可能會有斷章取義、以偏概全的危險，導致結果與事實的悖離，因此將關注的對象從文本擴大到情境（context）是必然的趨勢。

重視田野調查，強調從田野中取得第一手資料，而將情境的概念運用在民間文學的調查研究上的，是美國的人類學學者。

1950 年代以前，美國的民間文學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大派別，即人類學者和文學學者兩個陣營。人類學者的研究對象在國內主要以原住民印地安人為重，研究的重點在於民俗文化的整體，……他們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視實際的田野調查。而文學學者的民間文學研究在最初的階段以查爾德（Francis J. Child）為代表，則主要以歐洲原鄉及歐裔移民的民間歌謠、諺語和故事為主，他們當然也做田野調查，但似乎不是重點。他們同時重視既有的文獻資料，特別是歐洲的傳統，不論那些資料當初是如何取得的。也就是說，在這之前，美國文學學派的民間文學研究重視的是文獻、作品的整理、注釋；不像人類學派一樣，更重視實際的田野調查，所以人類學派常以為文學學派缺乏較為嚴格的學科規範。有的學者因此說，文學學派重視的只是“Text”，人類學派重視的則是

4 Linda Degh, “Narratives in Society: A Performer” in *Centered Study of Narration*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Press, 1995), p.9.

“Context”，也就是說，文學學派只重視文本內容，而人類學派重視的則是如何呈現那些內容的情境脈絡。<sup>5</sup>

美國人類學學者與民間文學學者在調查與研究民間文學上有很大的差異：首先，人類學學者透過翻譯去調查非本族、無文字的部落文化（印地安原住民）；民間文學學者則是直接使用母語去調查本族文化傳統（白種人為主）。其次，人類學學者將焦點放在情境上，不注重文本；民間文學學者則以文本為主，忽略情境。<sup>6</sup>人類學學者注意到文本只是浮現出文化當中的某個表徵而已，若將焦點集中在文本的調查和研究上，容易失之偏頗，於是他們開始用較廣泛、全面的角度去注意講述情境對民間文學的影響，因而發現情境對文本經常有直接且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雖然人類學學者已經意識到情境在民間文學中所扮演的重要腳色，然而其動機與目的卻是在透過原始部落的調查，從其民間文學中去觀察與研究人類文化的演變與發展；這與民間文學學者大多以自己的民族為調查對象，透過比較分析欲從其中觀察出民間文學變化的規則，找到人類創造民間文學的共同模式，其內涵十分不同。簡而言之，人類學學者是以民間文學為解釋的工具，將其視為人類文化呈現的樣貌之一，用此來解釋人類的生活型態、文化思考與變遷等等；而民間文學者卻將民間文學視為主體，從文學的角度與觀點來調查與研究民間文學。

民間文學學者與人類學學者分別從民間文學的內在（文本）與外在（情境）的角度切入去調查研究民間文學，若能將兩者合流，勢必能使民間文學的調查研究得到更全面、更廣泛的發展，益發能夠突顯民間文學迥異於作家文學豐富多變的面貌，以及其重要性。因此1960年代以後，美國民間文學界出現文本與情境合流的發展，於是對於民間文學的調查與研究不再只侷限於文本，更能將範圍擴大到講述情境等相關的調查與研究上面。不僅如此，到了1970年代更發展出表演論的觀點，Don Ben-Amos將民間文學定義成是小群體（小眾）之間人與人面對面的藝術性口頭交流傳通，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連串的條款項目。<sup>7</sup>而人類學學者Edward Sapir、B. Malinowski等，也開始注意到除了提供

5 胡萬川，〈真假之辨——有關民間文學流傳與研究的一個論辯〉，《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新竹：清華大學，2004），頁116。

6 Richard Dorson, *Folklore: selected essay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13-19.

7 Richard Bauman, *Folklore,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s: a communications-centered handboo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9.

確實的文本紀錄之外，也要包含表演的資訊。<sup>8</sup>對表演論者而言，文本不過是演述的骨架，必須以音調、節奏、韻律來傳達才是骨肉充滿之存在。而文本和表演關係密切，觀眾和聽眾也會影響文本。<sup>9</sup>表演論者不僅自覺到講唱民間文學是一種表演活動，更注意到諸多包括講唱情境及實際講唱的種種細節部份，例如表演人（講述者）組成及演述的情形：是單獨一人，或是多人組隊；是專業的，或是業餘的；是單純說唱，或是有樂器伴奏，或是有樂、舞伴行。還注意到聽眾（參與者）與表演人互動的關係：聽眾只能接受某種形式的表演，例如神聖的、嚴肅的、秘密的講唱等等；聽眾可以互動的講唱方式，例如愉悅的講述、說唱故事與笑話之類；聽眾積極參與講唱：有時候聽眾也會接續講述故事與說唱，但聽眾和表演者的腳色還是分開的。也注意到聽眾的組成：是必要的參與者，例如儀式中之必要參加者、聚會表演中的常客或熟客；或是臨時偶然的參與者等。<sup>10</sup>表演論者視講唱民間文學為一種表演活動，他們對於民間文學的採集、整理倍感困惑的是要如何將那短暫即逝的演述的成果，真實呈現於紙上，做成可保存的紀錄。因此如何將情境及內容做更為完整、真實的紀錄便是採錄、整理的工作重點。<sup>11</sup>表演論者認為口語譯成文字，不只在不同語言中有問題，在同一語言中也有問題，因為說、聽情境和閱讀有別。此外，研究者、文人常過分注意情節大要，而非努力描述的情節，因此常強調簡單的結構，而非記述複雜、老練的敘說情況，因此文字記錄，常不能認識到表演中之文化意含。<sup>12</sup>以上這些觀點都指出：將民間文學的調查與研究限定在文本是非常狹隘且片段的作法，必須將範圍擴大到講唱的情境，並且將講唱視為表演活動，因此與表演活動有關的各項細節都需去觀察與紀錄。

綜觀 20 世紀以來，歐美民間文學的研究、調查所關注的焦點從早期的文本（text）——即民間文學的內容、類型、結構等等，逐漸擴大到情境（context）——講唱的時間、地點、場合、進行的過程、講唱者與聽眾的互動等等，而美國更在近四十年來逐漸嘗試整合民間文學學者與人類學學者的研

8 Elizabeth C. Fine, *The folklore text: from performance to pri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3.

9 Elizabeth C. Fine, *The folklore text: from performance to print*, pp.4-6.

10 Ruth Finnegan, *Oral traditions and the verbal arts: a guide to research practic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95-99.

11 Elizabeth C. Fine, *The folklore text: from performance to print*, p.8.

12 Viv Edwards, Thomas J. Sienkewicz, *Oral Cultures Past and present: rappin and Homer*,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p.2-3.

究、調查方法，更重視田野調查，將文本與情境皆納入其中，並發展出表演論的觀點，將關注焦點更擴大到講唱者身上，視講唱者為表演者（performer），因此 text、context、performer 三者合併已成為美國近四十年來民間文學調查、研究的趨勢。

## 二

近四十年來美國已經將 text、context、performer 三者合併，視為民間文學的研究、調查目標，回顧台灣，近四十年來是否也有類似的自覺與發展？在台灣，民間文學的調查與研究對象主要有兩大類：一是原住民，另一是漢人。這兩類族群的民間文學內容、性質不盡相同，也因此調查、研究的方式略有不同，以下筆者就試著從這兩類族群分別去探討其民間文學的調查與研究是否有上述的自覺與發展。

### （一）原住民間文學的調查、研究

近四十年來參與原住民間文學的調查與研究者，主要有民間文學學者與人類學學者，以下分別討論之。

#### 1、民間文學學者

原住民間文學的調查與研究向來以人類學學者投入最多、時間最久、且最深入，而直到近十幾年來，民間文學學者才陸陸續續積極參與這項工作，下表是國科會這十幾年來民間文學學者所執行的原住民間文學調查與研究計畫，從此即可看出此一現象：

國科會原住民間文學研究計畫一覽表（1992-2005年度）

執行者	年度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李福清	1992	清華大學	台灣土著與漢族民間文學之搜集與比較研究
金榮華	1995	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	台灣南部原住民口傳文學之採錄與整理——高雄屏東地區卑南族與魯凱族口傳文學之採錄與整理
應裕康	1995	高師大國文研究所	台灣南部原住民口傳文學之採錄與整理——屏東地區排灣族口傳文學之採錄與整理
顏美娟	1995	高師大國文系	台灣南部原住民口傳文學之採錄與整理——台南地區平埔族口傳文學之採錄與整理

胡萬川	1995	清華大學中文系	台灣地區原住民民間文學之搜集與比較研究
顏美娟	1997	高師大國文系	台南高屏地區平埔族口傳文學之採錄與整理(II)
李福清	1998	靜宜大學中文系	賽德克族神話、故事搜集與比較研究
顏美娟	1998	高師大國文系	台南高屏地區平埔族口傳文學之採錄與整理(III)
林登順	2000	台南師院語教系	台灣南部西拉雅族之民間文學研究
浦忠成	2000	台北師院語教系	台灣原住民中部族群神話與文化關聯性研究
浦忠成	2000	台北師院語教系	台東卑南族口傳文學與習俗文化關聯研究
浦忠成	2001	台北師院語教系	東賽德克群口傳文學與其社會變遷關聯研究
許瑞容	2002	文化大學中文系	台灣花蓮泰雅族民間故事採錄與整理
鹿憶鹿	2002	東吳大學中文系	台灣原住民洪水神話研究
浦忠成	2002	台北師院語教系	阿美族群神話內涵差異研究
鹿憶鹿	2003	東吳大學中文系	百年來台灣原住民神話研究評述
陳器文	2003	中興大學中文系	發聲的萬神殿——台灣原住民鳥類神話研究(1/2)
顏美娟	2004	師大國文系	平埔族民間文學搜集整理與研究
鹿憶鹿	2004	東吳大學中文系	台灣原住民人類起源神話研究
陳器文	2004	中興大學中文系	發聲的萬神殿——台灣原住民鳥類神話研究(2/2)
劉秀美	2005	花蓮教育大學 民間文學研究所	宜蘭縣大同鄉泰雅族口傳文學採錄及研究

在這些研究者中，對山地原住民民間文學的調查與研究以金榮華與浦忠成投入時間最長，累積的資料最可觀。金榮華的重點主要在蒐集整理原住民民間文學，近十年來其所主持的團隊，到台灣山地各部落，透過當地人士的翻譯，進行田野調查，然後再將翻譯之後的資料加以改寫紀錄下來。其用田野調查的方式蒐集第一手資料十分具有科學精神；而透過翻譯會因此使資料失真，不過礙於語言的隔閡，這是不得已的權衡之計，情有可原；然而將資料整理成文字紀錄下來的過程中，又會使資料再一次失真，如何在這個過程中儘量保持資料的原貌，就十分考驗整理者的功力。對此問題，金榮華曾提出他的原則方法：

每個人說話都有他自己的風格，一個善於講故事的人，他的遣詞用語也常常極有趣味，所以，在整理紀錄時，以不影響講述人原有的語言風格為第一個基本原則。

對於語句意義不完整、關鍵性說明遺漏、甚至情節單元殘缺等情形，如果可以揣摩出語句的本意，可以推求出脫略的原貌，則可在有所

依據的情形下酌予補足，但絕對不能變動或增加情節，這是第二個基本原則。<sup>13</sup>

在此金榮華強調「以不影響講述人原有的語言風格為第一個基本原則」，這樣的要求就是在保持資料的原貌；而這樣的思考也具有積極的意義，即意識到講述人有自己獨特的風格，須予以保留。因此就這點而言，金榮華已初步將關注的焦點擴大到講述人（表演者）身上，注意到講述人在民間文學中的重要性，而不再只是注重文本而已。然而第二個基本原則提到：「如果可以揣摩出語句的本意，可以推求出脫略的原貌，則可在有所依據的情形下酌予補足……」，表面上看起來十分理想，實際上卻有矛盾之處。用「揣摩」、「推求」的方式去找出原貌，原本就植入整理者的主觀思想，雖說必須在有所依據的前提下進行，但仍然很難保持客觀。所以金榮華雖已初步自覺到保存講述人（表演者）個人風貌的重要性，但在實踐上卻仍有一段距離。

浦忠成是鄒族原住民，師事金榮華，從此踏入民間文學的領域。因為對於自己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有一份強烈的使命感，於是致力於鄒族民間文學的調查與研究，並旁及其他高山原住民。浦忠成將重心放在研究上面，以神話為主要對象，其目的在於從民間文學中探索原住民的文化面貌，進而建立原住民的文化架構，並深化其文化內涵，以及重新詮釋原住民歷史。故其研究仍以文本為主，並未觸及講唱者（表演者）的概念。對於資料的蒐集是以文獻為主田野調查為輔，而在田野資料的整理上，雖然調查的對象是自己的族群，語言上沒有隔閡，可以取得第一手資料，但他並沒有使用原音紀錄，而是用自己的敘述方式紀錄，也因此無法呈現出講述人獨特的語言風格與敘述觀點，就此而言，浦忠成的調查仍未意識到講唱者（表演者）的重要性。

在平地原住民也就是平埔族的民間文學調查、研究方面，顏美娟投注最多心力。她長期在台南高屏地區從事平埔族民間文學的調查，將故事整理成冊，<sup>14</sup>並與吳榮順合作，將祭祀歌謠錄製成CD。<sup>15</sup>平埔族已經漢化，沒有自己的語言，以福佬話為母語，因此同樣以福佬話為母語的顏美娟能夠從田野

13 金榮華，〈民間文學的紀錄和整理〉，收入王正雄總編輯，《民間文學的採錄與整理》（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

14 顏美娟，《台南地區平埔族口傳文學之採錄與整理》（高雄：高師大國文系，1996）。

15 吳榮順、顏美娟，《平埔族民歌》，（高雄：高雄縣立文化中心，1999）。

調查中取得第一手資料。而其整理資料採取原音紀錄的方式，<sup>16</sup>這種方式將講唱者敘述故事的語氣、觀點、思考如實呈現出來，最能完整保存講唱者的個人風格，相較於金榮華有「以不影響講述人原有的語言風格」的自覺，但在實踐上卻與此仍有距離的情況下，顏美娟的實踐可說更為徹底。因此就整理方式而言，顏美娟更能注意到講唱者（表演者）的個人特色。

綜而言之，近四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十年，民間文學學者對原住民的民間文學已經不再僅止於文獻的尋找，而能自覺到蒐集第一手資料的重要性，於是更進一步進行田野調查。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民間文學學者也觀察到講唱者（表演者）有個人的風格，並自覺到必須盡量將此特色呈現出來，雖然並非每位民間文學學者都能徹底達到這個目標，不過至少已經初步看到他們對講唱者（表演者）個人特色的注重了。其次在研究方面，民間文學學者仍然停留在以文本為研究的對象，著重在類型、故事情節的流傳演變、內容意義的探討等等，尚未意識到講唱者（表演者）也是重要的研究對象。

## 2、人類學學者

用人類學的方法調查原住民民間文學最早始於日本學者，他們深入部落採用田野調查的方式蒐集資料，且已有些學者諸如小川尚義、淺井惠倫等人開始採用原音紀錄的方式整理資料，他們用拉丁字母逐一拼出每一單位的語音，也記下意義，相互對照，<sup>17</sup>同時對於相關資料如講述人、講述時間、地點等，也都能附記在上。

日本學者的田野調查法，光復後由人類學學者繼續沿用；而原音紀錄的方式，礙於語言的隔閡，學者仍多用中文翻譯的方式紀錄資料。不過對於原音記錄的重要性，人類學學者唐美君很早即意識到，並撰寫專文倡導此觀念：

由記音而採集口語文學，能使調查者逐漸增加對當地語言之知識，學習單字及簡單之會話；此除對調查有助外，又為在田野與當地人增進友情之妙法。（頁65）……採集者將由錄音機中斷斷續續播出之音逐字記音完畢之後，須自始逐句念與報告人及翻譯人校正並定句段。<sup>18</sup>

16 用這種方式來紀錄以漢人語言講述的民間故事，始於胡萬川，此點將在「漢人民間文學的調查、研究」部分做更詳盡的說明，此處先略過不談。

17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台北：南天，1935）。

18 唐美君，〈民族學田野工作之翻譯問題與口語文學之採集〉，《考古人類學刊》25、26期合刊，1965，頁67。

其並指出美國學者 Boas 於 1914 年即主張要以記音的方法採集神話及故事。這項主張最大的目的在於透過部落語言的學習，融入部落社會中，而因此有效蒐集到相關資料；且用原音紀錄資料，雖「並不能完全免於由翻譯面引起之問題，但至少可使採集者知曉自己所採材料可靠到什麼程度，可以減少甚多因翻譯而引起之錯誤……」，<sup>19</sup>換句話說，其目的在於盡量做到保存資料的原貌，使其不失真。

在唐美君提出這樣的論點之後，陸陸續續有人類學學者即採用原音紀錄的方式整理資料，例如劉斌雄用此方法來記錄雅美族的傳說，<sup>20</sup>何德華、關馥、劉淑美用此方法來記錄泰雅族的傳說，<sup>21</sup>而日本人類學學者清水純來台蒐集噶瑪蘭族神話傳說也是用此方法紀錄。<sup>22</sup>

這些人類學學者採用原音紀錄的主要目的在於保存資料的原貌，其所著重的對象在資料本身，亦即文本，而非講唱者，雖會交代報導人（即講唱者，也就是表演者）的簡單背景，但並未如金榮華一樣有自覺到資料可以呈現講唱者的個人特色。

其次，唐美君根據 Bascom 及 Lomax 於 1959 年提出的理論，擬出口語文學採集所應注意的十項要點，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幾點將講述情境納入民間文學的調查內容中，不再將重點只放在文本的蒐集上面，清楚而具體將講述情境與文本結合起來，對台灣民間文學的調查與研究而言可說是相當大的突破：

- (1) 來源：指時、地、人之記錄。工作者應將採集日期、地點、報告人姓名、報告人身分、在當地之居住時期等逐項記錄。此記錄除能說明來源之外，在口語文學之比較研究上亦甚屬有用。……
- (4) 場合：注意各類口語文學之使用場合。調查其在何時、何地、說何種口語文學。例如，有的只在晝間說，有的只在夜間說，有的則無此限制；有的只在祭儀犧牲之後始說，有的無場合之限制等。此外尚須注意說者之身分。該社會中有無說口語文學之專家？如有，如

19 同上註。

20 劉斌雄，〈雅美族漁人社的始祖傳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0期，1981.12，頁111-169。

21 何德華、關馥、劉淑美，〈泰雅傳說五則〉，《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0期，1995.10，頁119-142。

22 清水純著，王順隆譯，《噶瑪蘭族神話傳說集——以原語紀錄的田野資料》，（台北：南天，1998.03）。

何養成？口語文學有無所有權。

- (5) 聽眾：觀察各類口語文學之聽眾。聽眾是否因所說口語文學之種類而有異。例如，有些故事只限對男性聽眾講，有些則只限對兒童聽眾講等。注意聽眾之反應，例如，是否當場鼓勵說者，同情故事中角色之不幸遭遇、喝采、笑、批評等皆為值得探究之現象。……
- (10) 採集於自然場合：應在現場採集材料。例如，一口語文學，應在大庭廣眾之間，月色之下，以樂器伴奏而說者，則採集者應安排此種場合而錄音之，因現場及聽眾能鼓舞說者之情緒。如只讓說者說給調查人聽而試圖由此而記錄之，則所得結果定難滿意。<sup>23</sup>

來源的記錄，能標示清楚資料由哪位講唱者（報告人）提供，再加上講唱者（報告人）基本背景的調查，可以由此比較出講唱者的個人風格；採集於自然場合的要求，讓民間文學回歸到其所產生的環境，如此才能展現其生命力。而場合的調查，才能將從民間生活中滋長出來的民間文學動態的面貌呈現出來，使其豐富的文化意涵得以呈現。過去對民間文學的調查將其從庶民生活中剝離，只侷限在文本的蒐集，這樣的作法只呈現出民間文學靜態的面貌，十分單面，也因此捨棄掉其諸多特色，呈現不出其多面、層出不窮的面貌，更很難展現出庶民文化的生命力；民間文學是動態文學，講唱者與聽眾之間的互動牽扯著民間文學所呈現出來的面貌，因此將聽眾納入觀察，將有助於研究民間文學如何呈現其多變性的特徵，及講唱者講述故事的心理狀態等等。美國人類學者 Bascom 及 Lomax 思考到講述情境的重要性，唐美君將此觀念引進台灣，並將它具體化，列出這幾項重點並加以說明，明白指出民間文學的調查不應該只限定在文本而已，更應擴及情境的觀察，她並將這些論點實踐在民間文學的採集上面，使民間文學的調查、研究目標因而擴大到結合文本與情境。

唐美君已經充分注意到講唱情境的重要性，但並未明白提出講唱者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須如何更進一步調查，可見其仍未清楚意識到講唱者（表演者）的重要功能，而這點日後宋龍生於 1998 年有清楚的說明：

在一個重視口傳文學神話傳說的民族中，任何一個說故事的人，都有他（或她）的一個版本和對其所說神話傳說故事的詮釋，因此不同的述說者，其本身就代表著他自己的一個獨特風格，這個風格是個人久

23 同註18，頁65-66。

經歲月錘鍊而養成的；同時也代表著他在他自己的社會文化脈絡中，對所說神話傳說故事的理解。有時候，他（或她）確實擔當著文化傳承者的任務；有時，他（或她）則又在為他（或她）所深信的觀念傳達著信息。希望藉諸神話傳說的述說，將其固執於心懷的信念廣被，使聽故事的人信其所言，以期匯集共識，開創新信念和展現口傳歷史的新局。<sup>24</sup>

在此宋龍生與金榮華一樣，都注意到講唱者個人風格的特性，而他更進一步將此納入社會文化脈絡中看待；其次，他也明白指出民間文學講述者擔負著文化傳承的任務，以及將其視為口傳歷史的一部份，這些觀念的提出較諸之前的學者能更清楚意識到民間文學講述者的重要性，不再將其只視為承載文本的工具，也將其從動態多面的講述情境中抽離出來，賦予其獨立的地位。而宋龍生也開始在其所記錄的田野調查資料中，另闢一個部分來介紹講唱者，包括其基本背景，及其對民間文學的講述態度，與講述的情境等。<sup>25</sup>雖非巨細靡遺，稍嫌簡略，但至少是在此之前眾多研究者中對講唱者最為重視的一位。

宋龍生已經自覺到講唱者（表演者）在民間文學中的重要性，也初步將調查研究的對象擴大到講唱者（表演者）身上，與之前的研究者相較，又向前邁進一步。即便如此，宋龍生的調查與研究仍以文本為主，講唱者（表演者）仍然只是陪襯的腳色，以講唱者（表演者）為主要對象的調查與研究仍未出現。

## （二）漢人民間文學的調查、研究

近四十年來台灣漢人民間文學的調查與研究以民俗學學者及民間文學學者參與最多、貢獻最大，人類學學者相對之下參與甚少，故此處暫不將人類學學者列入討論。而依照調查的觀念及方式的發展來看，實可分為兩個時期，也就是改編改寫時期，與科學性的普查採集時期。以下分別討論之。

### 1、改編改寫時期

這個時期的參與者以民俗學家、文獻委員為主。民俗學家通常從歷史文獻記載中去搜尋、整理、編寫資料，或是到各地去採集資料。從歷史文獻中所搜尋出來的資料，往往會被他們加以整理再重新編寫；而到各地採集的資料，往往不會註明出處，看不出地方的特色，而他們在紀錄資料時通常也沒什麼特定

24 宋龍生，〈前言〉，《台灣原住民史料彙編6——卑南族神話傳說故事集：南王祖先的話》（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7。

25 同上註，頁85、86、99、119、129。

原則，只求將故事情節清楚敘述出來，而敘述的方式都任由撰寫者自己的筆法自由發揮，有撰寫者個人的寫作風格在其中，離民間文學原始口傳的面貌甚遠，可以說民間文學已經是被他們改編改寫，有的甚至是另行創作過了。民俗學家將重點放在「文學」的層面上，著重在表現故事情節的精采度，將民間文學改編改寫成具有閱讀樂趣的文學，如此一來往往忽略了其口語表達的特性、帶有動態表演可聽可看的特質等等。也可以說，他們只注意到民間文學文本的部分，情境以及講唱者的特色完全被他們屏除在外。這類研究者有婁子匡、江肖梅、周青樺、施翠峰、吳瀛濤等人。

文獻委員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待民間文學，冀望以民間文學為材料重塑過去歷史的面貌，因此他們比較強調實事求是的精神，會將從文獻中搜尋出來的民間文學求證於地方耆老，或是直接訪談地方耆老蒐集資料；換句話說，文獻委員較具有人類學學者田野調查的觀念，能夠從真實生活中挖掘第一手資料。不過在紀錄資料時，他們的方式與民俗學學者類似，仍然沒有特定的原則，依照個人撰寫方式自由發揮，所以也是將民間文學改編改寫。不過比民俗學學者進步的是，他們經常會註明訪談的時間、地點、人物等等，而這種清楚交代資料來源的做法，能初步顯現出民間文學流傳的軌跡，及講唱者傳承了哪些種類的民間文學。雖然如此，文獻委員並沒有意識到講唱者的重要性，他們交代資料來源的做法主要目的是為了尊重講唱者，及突顯地方色彩，而實際上跟民俗學學者一樣，他們關注的仍然是文本。這類研究者最具代表性的是林衡道，此外各地方政府所延聘的文獻委員也有多人涉足民間文學領域。

民俗學學者與文獻委員整理、保存相當多數量的漢人民間文學，有其重要貢獻，然而若從調查研究是否具有科學性的角度來看，與人類學學者相較，他們的訓練相對地不足許多，例如他們對田野調查的投入較少，甚至有些人沒有這樣的概念，因此往往蒐集到的大多不是第一手資料；另外，他們整理資料採用改編改寫的方式，沒有一套原則方法，任憑撰寫者自由發揮，形同將民間文學再創造，沒有忠於原貌的概念。整體上而言，在量的方面，民俗學學者與文獻委員挖掘到甚多漢人民間文學，其數量甚至高過人類學學者所蒐集到的原住民文學；然而就質而言，人類學學者意識到民間文學與民間生活不可剝離的緊密關係，因此強調要進行田野調查採集第一手資料，且事後的整理必須採用原音紀錄，若無法以原音紀錄，也得堅守保存原貌的整理原則，故其所調查整理

出來的資料，其真實性與正確性往往高於民俗學學者與文獻委員。就嚴謹度、客觀性與科學性而言，人類學學者領先甚多。

## 2、科學性的普查採集時期

相較於原住民，漢人民間文學科學性的採集與整理開始得很晚，一直要到1990年代，然而短短十年所累積的成果已經高出原住民甚多。因為調查對象不是自己的族群，受限於語言的隔閡，讓人類學學者很快自覺、意識到採集的資料在透過層層翻譯之後恐有失真之虞，且無法表現出語言的特色，於是他們提出原音紀錄這種科學的方式；而相較於人類學學者，調查研究漢人民間文學的都是漢人，語言上幾乎沒有障礙，資料唾手可得，即使是少數像婁子匡等外省籍的研究者在不通曉台灣本土語言的情況下，也因為其他本土研究者能輕易將福佬話或客家話轉成中文記錄下來供他們閱讀，因此語言上的隔閡對他們影響不大，在資料容易獲得的情況下，讓研究者遲遲無法自覺到保存資料原貌的重要性，使漢人民間文學的調查與研究一直停留在以搜尋文獻資料為主的改編改寫階段。

將漢人民間文學帶入科學性的普查採集時期的是胡萬川。在看到大陸進行全面性的民間文學普查的工作並出版三套集成，以及認識到西方已將民間文學視為一獨立學科且透過大量閱讀去吸收其新觀念與新理論之後，胡萬川看到台灣民間文學調查研究的落後與不科學，積極想要改進，於是1991年他與俄羅斯民間文學學者李福清共同主持國科會「台灣土著與漢族民間文學之搜集與比較研究」計劃，負責漢族的部分；在計劃進行的同時，1992年春季，又與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合作展開民間文學採集工作，這是學術單位與地方政府文化機構首度合作蒐集民間文學。這種合作模式的目的是在於希望透過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的支持，及結合既有的文化資源，喚起當地人士去搶救當地民間文學的自覺，進而加入採集工作的行列。採集工作以鄉鎮為單位進行全面性、廣泛性的普查，採錄人員以當地的人士為主。

這種田野調查方式與人類學學者採用的方法有所不同，人類學學者是率領一批團隊深入部落調查；而胡萬川則是先訓練當地人士使其具備採錄的技巧與觀念之後，再讓他們進行田野調查。這樣的做法比起人類學學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原因在於：首先，人類學學者是以外來者的身分來採錄當地的民間文學，因此必須花一段時間來熟悉當地環境，與當地人士建立交情，才能讓調查

順利展開；而當地人士本來就熟悉當地的地理環境，更清楚資源所在，不須再花時間摸索。其次，當地人士與講述者多半是熟識或有關係，在采錄過程中容易與講述者建立默契，讓講述者配合的意願更高，提供更多的資料。此外，學者帶領的團隊限於人力往往只能針對一個或少數幾個地方進行調查；而由地方人士來負責調查只要地方願意配合，可以集結到許多人力，同時針對好幾個地方進行調查，較不受此限，因此範圍比較廣大。

這種普查方式的確能在短時間蒐集到數量不少的資料，因為在台中縣石岡鄉才進行短短幾個月的採集，1992年6月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就出版了《台中縣民間文學集1——石岡鄉客語歌謠》、《台中縣民間文學集2——石岡鄉閩南語歌謠》二書。有了初步的成果，更加肯定這樣的普查方式是最有效率的，也確定了這種學界與地方文化中心的合作模式，於是在國科會的支持之下，胡萬川主持「台灣地區民間文學調查、採集、整理、研究」計劃長達十年，其間合作過的文化中心有台中縣、彰化縣、宜蘭縣、高雄縣、雲林縣、台南縣、苗栗縣、桃園縣、南投縣等，而出版的民間文學集至今也已經超過百冊，蒐集到的數量之多超過1990年以前所得。

不僅在調查方式上有所突破，胡萬川還堅持採用原音紀錄的方式來紀錄民間文學。這種方式雖然曾被人類學學者採用過，但仍然不普遍；而漢人的部分，歌謠、諺語等因為形式整齊、有押韻，便於用此方式紀錄，所以時而可見，而故事類因為難度頗高，且之前從來沒有人有過用原音紀錄這樣的自覺，所以一直停留在改編改寫的階段。但是，必須仔細分辨的是，歌謠、諺語的紀錄大都只呈現文本的面貌，對於資料的出處、講唱的情境少做說明，而胡萬川所強調的原音紀錄則沒有這麼簡單，它必須盡量能夠保存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內容：

其一，講述的語言內涵（Texture）；其二，內容文本（Text）；其三，講述情境及相關背景（Context）。<sup>26</sup>

所謂「語言的內涵」指的是透過聲調、語調、語法等表現手法，表達內容情趣與主觀思想、意涵等等，而不同的講述者表現的手法不同，所呈現出來的內涵也不一樣，若只用改編改寫的方式勢必不僅無法表現出內容本身的情趣，也無法突顯出這些個人特質，因此唯有用原音紀錄的方式才能將這些特色一一保

26 胡萬川，〈工作與認知——關於台灣的民間文學〉，《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頁237。

存。「講述情境及相關背景」大體上說來包括：「講述者身分（Who）；講給誰聽（To Whom），也就是聽者是誰；在什麼地方講述（Where）；什麼時候講述（When）；如何講述或唱誦（How）；以及為什麼講述（Why）等等。在這些之外，或許還應當再追加一項，就是所講內容傳自何處，也就是講述者怎樣學到這些東西，有關傳承一類的問題。」<sup>27</sup>這些相關資料必須在田野調查進行時當面向講述者詢問，若有所得必須將其整理出來另闢空間說明。雖然同樣採用原音紀錄，但是人類學學者多半只是紀錄到前兩項，對於第三項注意到的人不多，即使如唐美君有提到在採錄過程須注意到講述情境與背景，但在紀錄資料時仍很少將此呈現出來。因此這樣的紀錄方式比人類學學者的方式涵蓋的內容更多更廣。

而之所以要將講述情境及背景的內容納入調查整理中，是因為胡萬川意識到民間文學涵蓋的範圍很廣，過去只調查文本的做法實在過於狹隘。不僅如此，胡萬川更注意到講唱民間文學的人在民間文學中一直擔負著重要的傳承意義，是民間文學調查、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而將講述情境及背景（Context）納入調查範圍，才能讓講唱者傳承的重要意義顯現出來。因此在1996年5月所發表的論文當中，他已經自覺到講唱者（表演者）的調查、研究的重要性，視講唱者（表演者）為傳承人。在文中他認為傳承人因身份的不同有部落中能通聖俗兩界的祭司、巫師，或遊走四方的吟唱者，或鄉下不識字老婦，或城鎮中能說善道的老先生等等，他們雖然在社會上的角色功能不盡相同，但卻都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人類學學者雖早已注意到這點，但他們往往以祭司、巫師為研究對象，偏重在研究其溝通聖、俗兩界，為人消災解厄的社會功能，其次才是他們作為「神話、傳說」等傳承者的角色。而對於祭司、巫師以外的那些世俗的民間文學傳承者，如遊走四方的吟唱者，或鄉下不識字老婦，或城鎮中能說善道的老先生等等，人類學學者一般而言不太注意，一直要到民間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之後，才受到重視而興起的。因此傳承人的研究不僅在民俗文化上有重要的意義，在民間文學的文學研究方面來說，也同樣有許多參考的作用。<sup>28</sup>

胡萬川是最早清楚提出傳承人概念且注意到傳承人重要性的學者，不僅如此，他更將概念與理論化為實際行動，實踐在田野調查中。2002年開始，在國

27 同註26，頁237-238。

28 同註26，頁243-244。

科會的支持之下他主持為期三年的「台灣地區民間文學積極傳承人調查研究計劃」，到台灣各地進行田野調查，全面尋找積極傳承人進行訪談，建立 33 人的資料庫，從中找出台灣民間文學積極傳承人的個別與共同特色，及其傳承方式的特徵，還有歷史、社會、文化等環境對其傳承的影響，以建立傳承人的背景資料，冀望日後能依據這項調查建立台灣民間文學傳承人的理論。

綜觀胡萬川這幾年來的努力，已帶領起調查研究台灣民間文學的一股新風潮。首先，他所倡導的科學性普查的概念及所示範的方式，已紛紛為許多學者及地方文史工作者學習，成為 1990 年以後調查民間文學的主要方式；其次，在多次舉辦研習營傳導搶救民間文學的重要性之後，已激起各地方政府文化機構的自覺，紛紛由各地主動發起採集整理的工作；另外，原音紀錄的方式也紛紛為許多學者及地方文史工作者學習跟進，成為目前整理民間文學最普遍的方式；最後，他最早看到傳承人的重要性，開風氣之先，著手進行台灣民間文學積極傳承人的調查，將調查研究的對象從 text、context 擴展到 performer。

### 三

近四十年來，人類學學者和民間文學學者各自對台灣民間文學的調查和研究貢獻心力，可是其間卻很少有所交流。在人類學學者方面，從唐美君到宋龍生，可以發現人類學學者對講述情境（context）與講唱者（表演者，performer）的重要性的認知，是深刻且具體清楚的；而在胡萬川之前，民間文學學者對這方面的認知十分貧乏，很少有人觸及這些早就被人類學學者注意的領域。而從時間的分佈來看，唐美君甚早提出調查情境的重要性，可是在胡萬川之前的民間文學者對這部分的調查卻甚少甚至完全排除，可見人類學學者與民間文學者之間鮮少交流互動。若要勉強說兩者之間有所交集，頂多只能說在調查方法上，少數民間文學者受到人類學學者的啟蒙，採用田野調查的方式而已。

直到胡萬川的參與，台灣民間文學的調查研究有了劃時代的突破，呈現嶄新的風貌。首先他採用人類學學者田野調查的方式採集民間文學，並將採集範圍由文本（text）擴大至講述的語言內涵（texture），以及講述情境（context）。西方民間文學的調查與研究從 1960 年以後出現文本（text）與

講述情境（context）合流的新發展，而台灣學界遲遲沒有這樣的自覺，直到1990年代在胡萬川的帶領之下終於也追上西方的腳步；其次，用口語表達的民間文學在轉換成文字紀錄下來時往往會嚴重失真，然而這個現象卻只有人類學學者注意到，而提倡採用原音紀錄的方式，這是目前用文字紀錄民間文學的方法中最科學且最能保存真實原貌的方式。可惜人類學學者雖有這樣的自覺堅持用這種方式的人卻不多，整理出來的資料數量也極為有限，仍然習慣透過翻譯改寫的方式紀錄資料。到了胡萬川，他堅持採用原音紀錄的整理方式，且積極訓練整理人才，並將這種方法廣為宣傳，於是在短短十年當中，用這種方式所整理出來的台灣民間文學專書就高達上百冊，其呈現出來真實、豐富、多變的面貌數量之多，遠遠超過1990年以前所得；最後，胡萬川也從講述情境（context）中注意到傳承人（表演者，performer）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於2002年開始展開台灣民間文學積極傳承人的調查，將text、context、performer結合在一起，擴大台灣民間文學的調查研究視野，帶領台灣民間文學走向一個全新的發展，追上西方的腳步。

綜觀這四十年來，台灣民間文學的調查、研究在1990年以後由胡萬川開各項風氣之先，且造成一股跟進潮流，使其具有劃時代的發展。這些發展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民間文學在台灣終於成為一門獨立發展的學科，透過科學性的調查、整理，真正開始累積第一手資料，不再附屬於民俗、歷史、人類學、傳統文學當中。期待這個嶄新階段所累積的成果，能讓台灣民間文學的發展脈絡逐漸清晰，並建構出一套屬於台灣民間文學獨特的理論。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台北：南天，1935）。
- 吳榮順、顏美娟，《平埔族民歌》（高雄：高雄縣立文化中心，1999）。
- 宋龍生，《台灣原住民史料彙編6——卑南族神話傳說故事集：南王祖先的話》（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01）。
- 金榮華，〈民間文學的紀錄和整理〉，王正雄總編輯，《民間文學的採錄與整理》，（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04）。
- 胡萬川，〈真假之辨——有關民間文學流傳與研究的一個論辯〉、〈工作與認知——關於台灣的民間文學〉，《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新竹：清華大學，2004.01）。
- 清水純著，王順隆譯，《噶瑪蘭族神話傳說集——以原語紀錄的田野資料》（台北：南天，1998.03）。
- 劉守華、巫瑞書主編，《民間文學導論》（武漢：長江文藝，2001年二版四刷）。
- 顏美娟，《台南地區平埔族口傳文學之採錄與整理》（高雄：高師大國文系，1996）。
- Elizabeth C. Fine, *The folklore text from performance to pri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Linda Degh, "Narratives in Society: A Performer" in *Centered Study of Narration*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Press, 1995).
- Richard Dorson, *Folklore: selected essay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 Ruth Finnegan, *Oral traditions and the verbal arts: a guide to research practic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Viv Edwards, Thomas J. Sienkewicz, *Oral Cultures Past and present: rapping and Homer*,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 Vladmir Jakovlevic Propp,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Press, 1968).

### 二、論文

- 何德華、關馥、劉淑美，〈泰雅傳說五則〉，《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0期，1995.10。
- 唐美君，〈民族學田野工作之翻譯問題與口語文學之採集〉，《考古人類學刊》25、26期合刊，1965。
- 劉斌雄，〈雅美族漁人社的始祖傳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0期，1981.12。